

基于教育共同体的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模式与路径创新

黄洁, 张邦卫, 陈晓凤

(浙江传媒学院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传媒产业深度结构性变革对传媒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倒逼高校传媒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创新, 催生产教融合方式的迭代升级。文章从教育共同体视角出发, 提出基于“融合、联动、协同的政产学教育共同体”发展理念的新闻与传播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模式以“学科融合、知识融合、技能融合、媒体融合”四位融合为目标, 打通课程教学链、内外导师链、科教平台链、实践基地链四个育人维度, 构建政产学研育人机制、运行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四大协同体系, 汇聚整合知识、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资源要素, 形成“全方位、全链条、全流程、全媒体”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专业学位硕士人才培养路径。

关键词: 教育共同体;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3) 06-0125-10

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到“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社会急需大批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优质人力资源。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科技发展加速媒体深度融合, 传媒产业新发展格局对传媒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在全球传播新环境下, 探讨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与路径, 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研究现状

2010年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作为我国新增专业学位类别首次纳入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 教育部官网及研招网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7月, 全国共有212个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点, 其中2021年新增49个学位点。新增学位点中有部分高校被列为教育部“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专业学位硕士学位授予权试点单位, 先行开展试点培养, 因此已开展招生培养的单位为168所, 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以2022年为例,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人数为5866人(不含推免生), 其中行业院校人数占比4.77%, 综合性院校人数占比95.23%。

(一) 文献综述

根据中国知网检索, 主题包含关键词“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和“MJC”的文献有168篇, 其中专业硕士(50篇)、人才培养或人才培养模式(26篇)、新闻传播或新闻传播学(28篇)为高频关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背景下政产学研协同培养传媒人才机制创新与实践”(2021090049); 浙江省“十四五”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以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为例”(SJG20230113); 浙江省教育厅立项资助科研项目、研究生教育学会项目“基于社会需求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研究——以浙江传媒学院为例”(Y202043817、2020019)。

作者简介: 黄洁, 女, 副研究员, 硕士; 张邦卫, 男, 教授, 博士; 陈晓凤, 女, 硕士。

关键词, 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研究产教融合传媒人才培养的较少, 从教育共同体视角研究传媒人才培养的为零。

毛颖、张宏伟、孙江等开展财经类、体育类、政法类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现状、路径探索研究。张淑华、刘山河、王媛等分别从北京、陕西、浙江等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现状开展调研, 并提出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魏彦、谢毅、刘安祺、池乐竹、刘林沙、贺明华等从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比较、质量保障体系、新闻传播教育认证标准等方面介绍了美国的经验做法; 吴锋等从英国顶尖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出发, 总结英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路径。不少学者从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导向、人才培养现状及困境与对策、课程设计、培养方案、双导师制、实践模式、产学研一体化培养等不同视角开展理论与对策研究, 为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启示。从整体看, 现有新闻与传播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研究处于初级阶段, 对专业学位硕士人才培养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有待深入, 立足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有待突破。

(二) 实证研究

1. 研究背景及目标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学术学位不同, “专业学位是一种具有职业背景的学位, 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立”,^[1] 其人才培养定位为“学术性”“实践性”“职业性”^[2], 而“产教融合培养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鲜明特征”。^[3] 因此, 产教融合深度、广度直接影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基于文献分析和实际调研, 了解传媒行业转型发展对人才素养的需求和新闻与传播产教融合高层次人才培养现状, 发现存在的问题, 分析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行业特色人才培养对策。

2. 研究方法及工具选择

研究采用访谈调研法, 形式为半结构访谈和座谈会。笔者所在项目组自 2020 年起就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展开专项调研。根据研究目标, 从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现状、存在问题、对策建议等三方面设计了《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调研访谈提纲》, 包含培养定位、课程设置、实践体系、培养方式、质量保障、产学研协同成效、产学研合作模式、产学研合作机制、产学研激励保障机制等 9 方面。访谈对象为来自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北传媒学院、温州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人才培养单位的 8 位从事教学管理人员, 以及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湖南广电集团、浙江广电集团、江苏广电集团、凤凰网浙江频道、网易、科大讯飞、爱奇艺的 8 位行业企业专家, 涵盖综合性院校、行业特色院校和地方院校等不同类别高校及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新媒体等不同类别企业。

研究使用 ATLAS.ti 8 质性分析软件对文本资料和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归类和编码。采用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核心编码等三级编码逐级分析, 通过归纳演绎提炼概念和范畴。操作方式如下: 分两个阶段编码, 第一阶段研读资料并对每一个句子进行识别、分析、概括, 使之概念化和范畴化, 合并相似度较高或概念雷同的编码, 提炼出主要的概念和范畴, 形成人才培养定位、知识体系、能力需求、职业素养、导师队伍、实践基地、实践教学、评价标准、利益分配、资源融通、风险分担、价值认同、合作方式、组织形式、政策扶持、经费支持、社会环境等 17 个主轴编码, 形成当前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分析 17 个概念类属关系, 确定育人模式、驱动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等 4 个核心概念和范畴。第二阶段为验证饱和度阶段, 对每个阶段编码进行二次比对、归类、查漏及纠错, 通过预留文本随机抽样检验饱和度, 确保没有新的概念和范畴。

3. 研究结果

将本文资料使用 ATLAS. ti. 8 质性分析软件分析, 编码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质性分析三级编码表

核心编码	主轴编码	开放性编码
育人模式	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不清晰, 专硕学术化培养; 学校培养与行业脱轨, 供需不匹配; 因循守旧, 人才培养跟不上行业发展
	知识体系	专业知识更新慢; 前沿知识欠缺; 知识交叉融合欠缺; 多元知识结构欠缺
	能力需求	融媒体复合技能; 全媒体综合能力, “一专多能”, 精通某一领域并对其他领域非常熟悉;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 信息筛选和分析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创新能力
	职业素养	家国情怀; 视野格局, 责任心; 有理想和职业情怀; 正义感; 政治敏锐性; 价值导向甄别能力; 职业敬畏心、敏感性、忠诚度; 较强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 个性活泼适应能力强
	导师队伍	压力大, 没有时间指导; 较少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 挂名导师, 没有指导过学生; 受学历和职称限制, 有些行业经验丰富业界较为知名的专家无法担任导师; 没有指导经费; 校内导师重理论轻实践, 行业经历少, 对一线情况不了解; 业界导师和校内导师缺乏沟通; 行业转型变革快, 业界导师队伍不稳定
	实践基地	以学校建设为主, 协议较为空泛; 基地产生成果和价值有限, 企业参与基地建设积极性不高; 企业没有经费支持保障学生的实习相关费用; 成果转化率低, 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基地建设速度跟不上扩招速度
	实践教学	实习实践学分占比少, 校内实践课程缺乏; 实践课程教材匮乏; 案例教学未能广泛使用; 实践平台资源不足; 与业界联手开发实践应用型课程较为困难
	评价标准	实习实践的考核不被重视; 未建立起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 人才评价标准单一, 毕业以论文为主, 纪录片、深度报道、调查报告等形式考核未被广泛使用; 论文选题来源于实践的少; 实践教学的质量保障体系未建立; 行业主体不参与教育质量评估
驱动机制	利益分配	知识产权和专利转让缺乏法律保障; 经济收益、专利成果等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资源融通	行业 and 高校资源信息不对称, 未能形成有效优势互补; 部分行业企业和高校的资源层级不匹配, 未能形成有效的资源对接
	风险分担	行业投入资源, 但最后收益成本不成正比, 没有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导致行业缺乏积极性; 人才培养的速度太慢, 成本较高, 辛苦培养的人才留不住
	价值认同	企业以营利为目的, 倡导效率优先, 高校以育人为目的, 倡导公平, 双方文化氛围迥异, 价值观有偏差, 未能找到共赢发展的利益平衡点和持续合作的激励点

续表

核心编码	主轴编码	开放性编码
运行机制	合作方式	高校和行业未形成有效的组织管理架构和合作对接机制，仅处于单一、局部、浅层、粗放的合作状态，合作模式单一，合作内容不深入，合作范围仅限于行业导师和实习实践两个层面
	组织形式	产学双方缺乏合作沟通机制，不以项目为依托的合作很难开展
保障机制	政策扶持	政府政策仅停留在指导性意见，没有实操层面的保障政策；知识产权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
	经费支持	政府在产学合作育人上没有持续经费投入，很难开展长期合作；导师在产学合作中未有收入和晋升等激励
	社会环境	社会对专业学位硕士的认知不到位；学校受资源限制，对专业学位硕士培养力不从心；社会未形成鼓励产学合作的良好氛围；缺乏有利于长期合作的产学合作激励政策和机制；企业看重短期利益与人才培养见效周期长之间的矛盾，阻碍产学合作的深入开展

二、问题归因

（一）“学”“术”并重的教育理念未建立，人才供需失衡

通过文献和访谈发现，当前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人才培养存在培养规模与行业需求失衡、培养规格与行业需求不匹配、培养方式的计划性与行业需求的市场化之间供需错位等问题，导致人才培养跟不上社会和行业的变革发展。虽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经过 20 多年的快速发展，其招生规模已经超过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到 2025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3]。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对专业学位认同度不高，存在认知误区。很多人认为专业学位硕士是低于学术性学位的非高级性学位。高校对专业学位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专业学位的定位和特点研究不充分，“穿新鞋，走旧路”，按照学术硕士的培养体系来培养专业学位硕士，使得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定位和目标设置与国家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定位及传媒行业变革对人才的需求脱节，进而导致社会各界对专业学位的教育质量存疑。专业学位是一种新型学位类型，与传统学术学位相比具有不同的特性，是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特定阶段，在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背景下的产物，其发展需要根据国家战略及行业发展不断调整完善，与之相应的政策的制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建设需要较长周期。

专业学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认知问题，受到根植于我国文化和教育体系中“重学轻术”的观念影响。在我国传统文化教育体系里，“学”被认为是高深知识的习得，具有高层次之意，而“术”被认为是一种技艺的习得，强调实用性。我国传统社会文化对高深学问的崇拜，使得我国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强调大学知识和教育过程的高深性。而专业学位硕士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术”的特质的教育，一直不被认可和重视。教育理念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才培养的定位、目标和模式。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传统单一的学术学位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迫切需要拓展“赛道”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位类型，其产生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和行业特征。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明确指出:“专业学位是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发展,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并明确提出建设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并重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政府正从规划和政策的层面加快推进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高校应尽快从传统的“重学轻术”转为“学”“术”并重,明确两类学位的发展定位和区别,构建与国家 and 行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提升培养质量,扭转社会对专业学位的认知偏见。

(二) 人才培养模式不科学,“产”“学”脱节

人才培养的理念定位是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原则和方向,是人才培养活动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如前所述,专业学位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其人才培养模式应与“学术性”“实践性”“职业性”的人才定位相适应。当前我国滞后的培养理念定位影响和制约了科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新闻与传播高层次人才培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由于智能媒体技术带来传媒生态系统的重塑,促使传媒学科外延拓展和知识体系重建,对人才的规格和标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原有传媒背景和技术手段建立的知识体系及以原有“重学轻术”人才目标建立的人才知识、能力、素养体系已不能应对新媒体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二是未建立以职业为导向的培养体系。“职业性”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课程设置、培养方式、质量标准、导师队伍建设上要与职业接轨,突出“实践性”。而在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实际培养过程中,未以“职业能力”为本位设计课程,未构建体现分类指导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或“双导师”团队合作制实施不到位,实践教学体系未建立或实习实践环节的管理、监控、考核不到位,行业关联性和参与度不够。三是未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当前专业学位硕士在理念、定位、模式上与学术学位硕士趋同的现状导致其在人才评价和质量保障上也未能与学术学位有明显的区分,聚焦内涵与特色的分层分类人才评价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还未建立。

以上问题,源于在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实施中,“产”“学”脱节,未建立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学位的设置和调整应基于市场和行业对人才培养规格的需求,产教融合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必然途径。产教融合要求高校和行业联合开展人才培养。高校应按行业要求制订培养方案,规划实施路径;行业应深度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参与人才评价标准制定。双方融合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决定人才培养的质量。而当前封闭办学的惯性思维使高校在与行业实施联合培养过程中欠缺开放性,未能充分发挥行业的主体作用和优势。行业单位由于未实现其自身利益和价值,合作内驱力不足,合作呈“偶发性、暂时性和不稳定”^[4]等特征,合作深度和广度不足,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陈旧,创新性建设不足,影响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 产教融合生态体系不健全,“融合”艰难

从狭义上讲,产教融合是一种教育模式,即高校和行业整合双方资源联合开展人才培养。从广义上讲,产教融合是一种教育生态系统,即政府、高校、产业等主体通过对彼此信息、制度、资源等要素进行深度整合,^[5]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访谈者将当前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人才培养存在的“产”“学”脱节,融合艰难等问题主要归结于育人机制、运行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等体制机制不健全。从本质上讲,这种体制机制的缺陷不是高校和行业可以解决的。产教融合需要在政府的指引和推动下,借助市场实现产教资源的配置和要素的驱动。政府、高校和行业三者密切合

作,相互作用,缺少任何一方,都会影响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当前,在产教融合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上,政府、高校、行业都没有发挥好应有功能:政府在专业学位顶层规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有待加强,在高校和行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尚待发挥,在价值观引导、资源共享、机制共建上有待提升;高校和行业各自为政,未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和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态势;产学研组织边界壁垒未打破,使各自的资源未能有效流动,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要素活力未能激发。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产教融合生态体系不健全,从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到外部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支持等尚需系统性规划;政府、高校、行业各司其责、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尚未建立。因社会角色、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三方主体在产教融合培养专业学位硕士上未形成共识和基于共识的整体行动逻辑,未形成基于共同目标的行动合力,未形成整体性结构布局和系统化路径,未形成基于规则和制度的联动机制。

综上所述,政府、高校、行业作为产教融合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主体,三方作用的充分发挥决定着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本文提出“共同体”理念,通过构建政产学研教育共同体,破除产教融合障碍,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形成利益目标共同体同心同行。“共同体”构建,既是产教融合专业学位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口,也是产教融合生态系统构建的重要路径。

三、路径创新

(一) 理念创新:构建政产学研教育共同体理念

“共同体”概念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与“社会”不同,基于人的自然意志,以血缘、地缘联结,强调共同生活方式、共同信念、互为联结、相互沟通,是精神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的结合。^[6]芝加哥学派帕克将共同体思想沿用至现代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中,继承发扬了滕尼斯共同体理论;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一书中,认为“共同体”是基于主观上和客观上共同特征而组成的紧密团体和组织,包含有形和无形的共同体,意味着确定性和安全感^[7];德国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的本质,认为“真正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由此我们认为,所谓“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稳定的组织形态,成员之间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教育共同体”引申自“共同体”,是指各教育主体之间具有共同的教育信仰,为了共同的教育目标,以规则和制度为行为支撑,组成可以信赖的权威结构,以开放、共享、自治共建公共教育生活。^[9]政产学研教育共同体就是指政府、产业、高校三方不同利益主体因共同的发展需要联合起来,通过规则和制度维系各利益主体的运行,通过利益联结实现互惠共赢,以整体联动和系统发展的思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确保三方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的行为实践中实现共同发展。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产产教融合模式经历了以项目制为主的松散型合作模式“合作育人”,到政产学研合作拓展期,建立以契约制为主的紧密型合作,通过组织化模式实现“全过程育人”,再到政产学研融合期,通过一体化合作模式实现“全方位育人”。产教融合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三方在联合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欠缺,培养成效未达到预期。主要是政产学研三方在价值观上未达成共识,在行动上未形成合力。当前信息技术的裂变式发展迎来媒体产业革

命,引领人类步入智能时代,知识创造、流动、共享、转化、再生产需要更通畅的渠道,企业的人才、信息、资金、资源需要更开放的平台,经济转型发展需要更高效的载体,共同体为问题的解决带来可能性,构建政产学教育共同体是推进产教融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传媒人才的必由之路。

(二) 模式创新:重构政产学研育人新模式

新模式以“学科融合、知识融合、技能融合、媒体融合”四位融合为育人理念,打通课程教学链、内外导师链、科教平台链、实践基地链四个育人维度,构建政产学研育人机制、运行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四大协同体系,汇聚整合知识、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资源要素,形成“全方位、全链条、全流程、全媒体”的鲜明特色模式培养高层次人才。

1. 以“四位融合”为育人理念,重构交叉复合的知识体系

“媒体融合包含技术融合、内容融合、终端融合以及媒介形态融合、媒介产品融合、组织结构和产权融合”,^[10]强调一体化、整体、整合的特征,要求传播思维、传播方式、传播关系、传播技能等都发生极大转变。媒体的深度融合要求学界作出相应的回应,培养复合型人才。新闻传播学也必须突破本学科的界限,与其他学科产生交叉融合,创新知识生产。随着媒体融合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交叉已不再局限于早期的人文、社会、政治等学科,而转向与管理学、经济学、艺术学、信息科学、伦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作为知识生产主阵地的高校应及时跟进知识的创新生产,拓展学科边界,并将学科融合落实到人才培养上,通过在新闻与传播专业下设置学科交叉专业方向,如智能媒体传播、新媒体运营管理、影视传播等,同步拓展人才培养方向。倡导吸纳背景多样化的生源,利用学科多元化师资和双师双能型师资,开设学科交叉融合性课程和校企联合课程,利用校内和校外两类基地,学科、科研和实践等多元化平台,促进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同步更新,从而实现人才培养上的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人才的知识和技能融合往往又产生创新,反作用于学科和行业,为学科带来新的生机,为业界带来新的发展。

2. 以“四链贯通”为育人平台,构建分层递进的实践教育体系

实践能力是专业学位硕士培养的核心能力,实践教育体系应在政产学多元协同下,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四链贯通”不仅指课程教学链、内外导师链、科教平台链、实践基地链各自链条的全程贯通,还包含四个链条之间的横向互动,形成实践教育生态网络。以双师型教学队伍和双导师制的科学组合提高学生全方位能力;以学科知识、专业知识、实践知识、社会服务知识、科学研究和创作知识的知识架构建立课程体系。平台是知识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学校应构建包括模拟仿真实验平台、科研创作平台、社会服务平台等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知识转化功能。基地是对接人才职业能力与产业需求的重要场所,应构建含校内外、国内外、体制内外等多元化多类别多领域的实践机构,为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锤炼职业技能创造良好条件。通过四链纵向贯通,横向联动,构建“平台+内容+渠道+终端+应用+教育”的高效媒体融合教育生态系统,拓展媒体融合实践教学生态圈,协同推动实践教育体系的构建。

3. 以“三全育人”为培养机制,构建政产学协同育人体系

“三全育人”是指全媒体能力培养全流程、职业素养拓展全链条、政产学参与全过程。媒体融合使媒体内容、平台、技术、渠道、管理等朝着一体化、深度融合方向发展,“全媒型”人才是契合行业转型发展所需的人才。“全媒型”突出“全”,对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和能力提出了全面要求,既要培养基

于“传媒+交叉学科”的复合型能力,又要培养基于“传媒+全流程”的全媒体应用能力,既要有基于“大平台”“大内容”的采写编评摄制播能力,也要有媒体整合运营能力、数据挖掘和可视化能力、利用平台与用户沟通的社交能力以及适应媒体行业发展的创新能力。“全媒型”人才培养对实践教育资源、教学形态、前沿设备技术提出了新要求。“三全育人”培养机制通过政产学多元协同共建育人平台,打通学科链、产业链、资源链、资金链、信息链、技术链,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核心,整合高校、企业和政府的资源优势和能力优势,丰富合作机制,共同参与招生选拔、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实习实践、论文指导、论文答辩、评价标准设置等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政产学协同育人发展新格局。

(三) 机制创新:保障政产学教育共同体实施

政产学研教育共同体具有以下主要特征:①目标导向性:成员具有一致的目标共识,目标能兼顾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和需求,能提升共同体成员的内聚力和驱动力。②开放共享性:共同体成员在媒体技术革命下打破边界,与组织和环境深度融合,共享人才、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共同创新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以开放的形态推动进一步的融合。③组织系统性:共同体打破分散自发、自下而上、不确定的无序状态,发展为自觉集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确定的有序的状态。从宏观上讲,教育共同体作为系统性建设工程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大政产学教育共同体;从中观上讲,共同体成员之间应有相应的组织和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开展整体性系统化规划,共建战略规划、顶层设计、组织框架、运行模式;从微观上讲,共同体成员内部的组织架构、制度建设、基础建设等应进行统一规划,与外部组织系统进行系统联动。④协商民主性:共生共赢的价值导向要求共同体成员具有求同存异的包容精神,以平等相待的方式,开展民主协商,确保平衡性、稳定性的同时激发各主体的自觉力和创造力。基于政产学教育共同体的以上特征,在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应打破藩篱和壁垒,进行价值重塑、结构重组和机制重构。

1. 价值重塑,彰显共生共赢内涵

政产学教育共同体是一个由多元主体参与、多种要素汇聚、多个环节构成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交织着政府部门的行政文化、行业企业的商业文化和高校学术机构的学术文化等不同组织文化,三种文化交织碰撞,容易引起分歧和摩擦,增加协调成本和风险,只有坚持兼容并蓄的文化观,使多元文化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交流碰撞,产生新的灵感和创造力,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个体目标和集体目标双达成,并在一次次目标达成中建立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组织认同和制度认同,从而完成共同体价值重塑。培育共同体文化是使三种不同的组织文化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取长补短、共生共赢的前提和基础。教育共同体是“和合共生”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在教育领域的现代继承,体现共生、共赢、共发展的集体价值追求,倡导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和共同一致的目标,体现的是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维,建立的是一种基于整体的自觉而有序的行动状态,追求的是一致的利益和发展需求,在共同创造价值、利益过程中实现个人、组织、共同体的整体发展。政产学教育共同体既是精神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

2. 结构重组,强调开放平等关系

共同体思维是一种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必然要求“去中心化”,即打破“中心—边缘”结构,实现政产学多元主体平衡发展。因此共同体建设必将是一场组织模式的变革,改变多元主体之间的关

系,催生多元主体关系的重构,包括:①组织结构转型,把政产学研教育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整合机构、整合功能、整合资源、优化流程等方式进行整体性结构布局 and 系统化路径设计,变封闭为开放,变单一为多元、变单向流动为多点辐射、变线性为非线性网络集成,明确组织架构、运行模式和规则制度,促进组织机构作用的充分发挥。政产学研基于共同的目标追求,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共建战略合作机构,负责战略规划的设计,规则制度的订立,多方责权利协调,资源的管理、协调与分配,目标的考核、履职的监督等,促进资源的充分整合和高效利用。②合作关系转型,过去的政产学研合作中,更多是产学研合作,政府是主导者,但不直接参与,只承担引导、组织、协调、规章制度制定的职能,而共同体建设要求多元主体同时作为参与主体,利用各自社会分工、资源禀赋和能力专长,共建平台,共享资源,共担责任风险,协同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多元主体之间不再是主导与被主导、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是开放包容、平等互助关系,强调民主协商和共享共治的合作原则,开放共享优质资源,协同攻克关键难题,实现多元共同发展。

3. 机制重构,突出系统推进

构建政产学研育人机制、驱动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四大保障体系,汇聚整合知识、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资源要素。育人机制包含学生培养和青年教师培育,高校作为育人主体,需要将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与育人结合在一起,通过政产学研共同体的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培育一流科研团队,解决面向国家战略、社会发展和行业前沿的重大问题,打造一流学科,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服务国家需求。育人机制是政产学研教育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关键,高水平科研需要高水平团队的支撑,而高水平科研人员来自高校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高水平学科研究可以转化成教学资源 and 科研成果,通过学科融合、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的方式不断培育优秀人才。

驱动机制又指动力机制,包含外驱动力 and 内驱力,是政产学研多元主体开展以育人为目标的驱动力,外部驱动力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行业发展需要、政府政策推动等因素,内驱力表现为共同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因共同的价值追求,通过互动、协同、联动形成整体合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利益最大化。内驱力主要来自利益动力、文化动力、发展动力。高校作为学术教育组织以提升社会声誉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利益驱动,从而获取在同类主体之间的发展优势;企业在高校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下,获取人才、市场竞争力 and 经济利益;政府追求社会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转型及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而共同体文化是激发主体成员实现共同目标的隐形力量。

政产学研共建需要有一个持续机制,约束和规范共同体主体成员的行为,确保组织运行流畅。组织管理体系是保障共同体运行的重要载体。政产学研教育共同体共建战略决策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学术部门、监督部门,分别对共同体提供战略规划、资源要素管理、科研究及成果转化 and 监督经费使用。分工合作,确保资源、资金、人才等要素在各成员之间有效流动,实现各主体互惠互利,优势互补。

保障机制包括质量保障、政策保障、制度保障、资金保障。如何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在价值共创活动中,构建科学、系统、持续、创新、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推动政产学研教育共同体协同育人的重要支撑。多元主体通过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指引共同体发展方向,通过政策制度保障各主体的合法权益,通过提供资源信息平台,有效整合人才、知识、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通过融资配套服务确保研发、育人等活动的顺利实施,通过绩效评价评估 and 测量育人效果、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确保多元主体整体利益最大化。

四、结 语

政产学教育共同体的构建是迎接科技革命引发的传媒行业巨变，有效破解传媒高层次人才培养瓶颈的重要策略，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产教融合领域的有益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政产学教育共同体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多元主体不断统一共识、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协同创新，从而推进媒体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作为知识创新源泉、创新人才培养摇篮和技术创新推动者的高校，将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 [1] 别敦荣等. 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1 (4): 77-80.
- [2] 张淑林等. 产教融合标尺下我国工程硕士联合培养的现实审视与推进路径——基于全国 108 家联合培养基地的实证分析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3): 77-82.
- [3] 关于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的通知 [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26/202009/t20200930_492590.html.
- [4] 柳友荣等. 应用性本科院校产教融合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 (5): 64-68.
- [5] 马永红等. 我国产教融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内涵、类型及发展状况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 (7): 12-18.
- [6] [德]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M]. 林容远,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48-76.
- [7] [英] 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 [M]. 欧阳景根,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
- [8] [德]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中央编译局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89.
- [9] 刘阳. 论教育共同体的内涵与构建原则 [J]. 当代教育论坛, 2014 (4): 35-42.
- [10] 孙保营.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与传播硕士培养体系的构建 [J]. 新闻大学, 2013 (11): 81-84.

[责任编辑：华晓红]